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 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李军全

内容提要 基于抗战大局和自身发展需求,中共在节庆活动中围绕国旗和党旗的使用进行着双重思虑,即如何在独立的政治前提下表征国家的统一,如何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中显示自身的独立。依据政治斗争形势和节日类型,中共适时地调整策略,有选择性地引入、使用国旗和党旗,这使得它们在节庆活动中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变化轨迹。透视这种变化,既可以洞察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的命运,又能洞悉中共处在严峻的政治局势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 中共革命 抗日根据地 节日 国旗 党旗

李军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100006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重要象征”^[1]。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一般是政府、政党或政治团体借助旗帜使抽象的政治权力具体化、形象化,因为在政治精英眼里,具有象征意涵的旗帜早已是“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一套技术策略”^[2]。被附加了政治权力的旗帜一旦被使用在具体的现实权力关系中,就变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成为政治力量申明政治立场或宣示自身权威的符号。透视这种旗帜,既可以观察到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的坎坷命运,又能感受到政治力量借助政治符号展演权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而具有国家象征意涵的国旗和代表政党形象的党旗便是一个极好的透视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的国旗是指中华民国国旗(下简称国旗),党旗指的是中共党旗(下简称党旗)。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国旗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研究视野较宽泛,但主要聚焦在中国国民党、汪伪政权等政治力量上,鲜有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国国旗之间

[1]李学智:《民国国旗之争》,〔开封〕《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2]马敏:《政治象征:作为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功能》,〔上海〕《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关系的考察^[1]。鉴于此，笔者尝试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为地域分析中心，以中共根据地机关报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为史料依据，考察 1937—1949 年间中共在节庆中国旗和党旗的使用情况，希冀梳理出中共借助现代政治符号建构革命政权权力象征的变化过程，从而提供一个观察中共在革命中进行政治权力技术运作的微观视角，这对全面理解中共革命、拓宽抗日战争研究视野或有裨益。

一、维护“统一”：国旗使用

土地革命时期，囿于国共政治路线和阶级利益，中共在控制区域并未使用中华民国国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相继改变各自政策，重新携手，一致对外。按照双方合作的相关协议，在中华民国组织框架下，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中。此种政治情势下，象征着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国旗被中共引入根据地，作为服膺国家统一的符号被边区政府使用在节庆活动中。

从相关资料来看，笔者难以判断国旗被引入中共根据地的确切时间，稍能确定的是全面抗战爆发第一年内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中使用国旗的现象并不普遍，该时期无论是陕甘宁根据地，还是华北根据地的主要机关报中都没有发现国旗使用的事例。直到 1938 年延安庆贺七月节的时候，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1938 年 7 月，延安市各界筹划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和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周活动，7 月 6 日“商人日”时，延安街头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同时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筹备处发出通知，命令 7 月 7 日全市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部队一律降半旗致哀^[2]。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国庆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国旗被再次使用，西北青救会还在开大会前，组织全场向中华民国国旗敬礼^[3]。到了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国旗不仅被普遍悬挂，还成为大会议程中的重要环节：向国旗敬礼^[4]。可见，国旗在延安被使用的现象愈来愈普遍，这表明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根据地维护统一的象征获取了中共内部的认同，也意味着国共之间的政治关系逐渐理顺。

受延安的影响，各地方根据地相继引入中华民国国旗。在太行根据地，1939 年 7 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七一”纪念大会，开会前举行升国旗仪式^[5]。11 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不仅在会场悬挂国旗，连主席台上都悬挂着国旗^[6]。在晋察冀根据地，1940 年 7 月，晋察冀二专区召开“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会前升旗鸣炮，仪式极为庄重^[7]。在晋西北根据地，1940 年 12 月，晋西各界举行“双十二”纪念运动大会的会场悬挂国旗^[8]。可以看出，随着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不

[1]主要成果有：赵友慈的《从汪伪政权的“国旗”问题看汪精卫的汉奸嘴脸》，〔天津〕《历史教学》1992 年第 1 期；李学智的《民国国旗之争》，〔开封〕《史学月刊》1998 年第 1 期；张永的《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陈恒明的《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有所涉猎；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略有谈及；关于中共与中华民国国旗关系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丸田孝志发表的两篇论文：《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3-341 页）和《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陈廷湘主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 2010 年版，第 166-199 页）。

[2]《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的最后三天》，《新中华报》1938 年 7 月 29 日。

[3]〔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3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5 页。

[4]《延安万余民众举行大会庆祝十月革命及中共六中全会》，《新中华报》1938 年 11 月 10 日。

[5]《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纪念中共成立十八周年》，《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 年 7 月 5 日。

[6]《十八集团军总部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 年 11 月 15 日。

[7]《二专区各界纪念抗战三周年》，《抗敌报》1940 年 7 月 18 日。

[8]《晋西各界纪念“双十二”团结抗战》，《抗战日报》1940 年 12 月 18 日。

管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还是各地方的根据地都引入国旗,且在节庆活动中广泛使用的。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摩擦冲突不断,但是这种政治局面没有影响到中共根据地对国旗的使用,以 1941 年为例加以说明。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对国民党进行了激烈的、大规模的舆论谴责,但是国旗仍旧被用于各种纪念日庆祝活动中。3 月,太行区民兵举行“三一八”大检阅,会场悬挂国旗^[1]。5 月,太行区工人召开“五一”庆祝大会,各家各户的门楣上都悬挂着国旗^[2];7 月,太行辽县桐峪镇各商户为纪念“七一”,普遍悬挂国旗^[3];晋西北各界在纪念“七七”大会时,全场举行升国旗仪式^[4]。9 月,太行 129 师举办纪念“九一八”运动大会,会场悬挂国旗^[5]。10 月,延安各界召开“双十节”纪念大会,不仅有升国旗的仪式,还有全体向国旗致敬的举动^[6]。11 月,延安边区参议会选择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开幕,会场悬挂国旗^[7]。显然,国共关系虽处于紧张的状态中,但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没有退出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不仅被使用于边区政府政治层面的各种活动中,还逐渐向根据地社会层面延伸,出现家家户户悬挂国旗的现象,甚至,升国旗、向国旗敬礼等举动几乎成为节庆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程序,这足以申明中共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足以显示边区政府将国旗视为国家权威的决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合作呈现破裂态势,但是象征中华民国权力的国旗仍未退出中共根据地,反而形成了在政治协商建国的期待及抗战胜利喜悦中被普遍使用的状况。1945 年“双十节”,延安市通衢街道,遍扎彩牌,国旗飘扬^[8];张家口组织四万人纪念大会,会前举行升国旗仪式^[9];晋察区宣化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会场国旗飘扬^[10]。十月革命纪念日,延安市彩楼矗立,红绿标语鲜艳夺目,国旗迎风招展^[11]。1946 年元旦,延安各界欢庆新年,全城屋顶飘扬着国旗^[12]。“二七”纪念日,平绥铁路总工会组织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两面国旗交叉悬挂^[13]。元宵节,晋绥各界召开庆祝和平民主纪念大会,大会举行升国旗仪式^[14];太岳区组织庆祝和平民主大会,阳城各家商号纷纷悬挂国旗^[15];长治举办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荫城区各村群众就像潮水一样排着队,打着鲜艳的国旗涌进大街和会场^[16]。可见,不论是中共控制牢靠的巩固区,还是新解放的地区,悬挂国旗俨然是根据地节日庆祝必不可少的元素,不仅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工厂等机构节庆时使用国旗,社会群众节庆时也使用国旗。应该说,此时的国旗作为国家民族取得战争胜利的象征,受到中共根据地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象征,受到边区政府前所未有的重用。

此外,为显示对国旗的尊重,表达维护统一的决心,中共极力规范根据地国旗使用的行为,颁布法

-
- [1]《太行山武装起来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 年 3 月 27 日。
[2]《太行工人欢声雷动万人聚会庆祝“五一”》,《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 年 5 月 5 日。
[3]《万众同庆“七一”》,《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 年 7 月 7 日。
[4]《晋西北各界纪念“七七”四周年》,《抗战日报》1941 年 7 月 7 日。
[5]《一二九师运动大会“九一八”开幕》,《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 年 9 月 17 日。
[6]《国庆三十周年延安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1 日。
[7]《延安盛大群众集会》,《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 6 日。
[8]《延市热烈庆祝国庆》,《解放日报》1945 年 10 月 11 日。
[9]《张市举行空前盛会》,《晋察冀日报》1945 年 10 月 12 日。
[10]《晋察区及宣化各界热烈庆祝双十节》,《晋察冀日报》1945 年 10 月 14 日。
[11]《延安两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解放日报》1945 年 11 月 8 日。
[12]《延市各界欢庆新年》,《解放日报》1946 年 1 月 2 日。
[13]《昨日“二七”23 周年,张市工人盛大纪念》,《晋察冀日报》1946 年 2 月 8 日。
[14]《隆重庆祝民主和平大会》,《抗战日报》1946 年 2 月 20 日。
[15]《阳城万人庆祝和平民主》,《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 年 2 月 19 日。
[16]《元宵节在长治》,《新华日报》(太行版)1946 年 2 月 15 日。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令,进行制度约束。1940年5月,在一份内部文件《政治情报》上,中共刊出尊重国旗的通知,宣称中华民国国旗是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全国人民所公认的,代表中华民国的旗帜,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是目前统一战线的旗帜,认为尊重中华民国国旗就是在爱护国家民族的忠诚,指令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学校团体必须按法定尺码自制国旗一面,凡遇到各种纪念日、公开集会,均须挂国旗^[1]。对于如何悬挂国旗,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凡是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商店,在广场上、屋顶上或门前设置有固定旗杆者,每逢星期日及纪念日,均须悬挂国旗,日出时升旗,日落时降旗”,并规定国旗悬挂法:“凡设置有固定旗杆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商店,悬挂国旗时,应将国旗升于旗杆之顶,使国旗与地平面平行;凡无固定旗杆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商店、于纪念日悬挂国旗时,应将国旗升于临时旗杆之顶,使旗杆与地平垂直线成四十五度之斜度,悬挂于门前之侧;无论室内室外,凡遇有须将国旗与盟国旗帜或与党旗同时交叉悬挂时,必须将国旗置于其他旗帜的左边;凡遇下半旗时,国旗不置于旗杆之顶,而置于旗杆顶下等于身長二分之一处。”^[2]法令的颁行不仅约束了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中国旗使用时的随意成分,还使“悬挂国旗”由一个必备的集会程序上升到庄严的法律层面,这有力地表征了中共对“中华民国”这面大旗的尊重与敬畏,对民族国家统一服从与维护的坚定与信心。

二、保持“独立”:党旗使用

一个组织健全、体制完善的政党多有属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党旗。在政治活动中,党旗通常是政党权力与形象的鲜明象征,也是政党组织具有独立性的具体表征。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自诞生起便模仿联共(布)党旗制作出属于自身的党旗。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旗作为中共组织系统独立性的一种象征符号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在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肤施商谈共同抗日问题时,中共党旗就被使用,与国民党党旗交叉悬挂在会谈地点门口^[3]。此后,中共党旗频频出现在国共两党政治商谈的会议场所。显然,这是中共坚持组织独立的鲜明表征,也是取得与国民党平等地位的一种表现。

随着国共谈判结束及统一战线的建立,囿于中华民国统治框架,中共党旗的使用明显受到此种政治形势的制约,无论是在使用场合和区域,还是使用时间方面都发生变化。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华民国国旗普遍使用于各种节庆、仪式和场所中,而中共党旗逐渐淡出。据相关资料统计,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共党旗使用的情形极为少见,这种情形到了抗战胜利才有所变化:为庆祝抗战胜利,延安各界二万人集会,会场悬挂了党旗^[4]。中共党旗此种遭遇在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报告中也得印证。据谢伟思描述:“延安是一座满城旗帜飘扬的城市。每星期天,都照例把旗子高悬起来。旗子当然是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党旗。而且也不用共产党的红旗。”^[5]虽然中共党旗淡出了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但并不意味中共放弃了组织的独立性,只是在如何使用中共党旗表征独立的问题上,延安的态度甚为谨慎,此表现由特殊的政治局势、统一的政治局面所致,也体现了中共避免旗帜使用带来国共摩擦的担忧。

与延安的谨慎不同,为宣扬自身独立华北根据地在节庆活动中大胆地使用中共党旗。从各地方根

[1]《尊重国旗》(1940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A217-03-09-01。

[2]《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关于悬挂国旗应注意事项》,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3页。

[3]程栋等编:《图文20世纪中国史(第四卷)》,〔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8页。

[4]《延安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

[5][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0页。

根据地机关报来看,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旗节庆活动中被使用的情形较为常见,尤其是“七一”纪念活动中。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七一”纪念日,中共北方分局召开纪念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党旗^[1];同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纪念社论,版头刊登党旗^[2]。1942年儿童节,北岳区组织大会,会场悬挂党旗^[3]。1943年“七一”纪念日,中共北方分局组织干部晚会,会场党旗飘扬^[4];晋察冀军区举办纪念大会,各直属机关、部队、学校在灿烂的红星和红旗的光辉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巨像前集合起来了^[5]。此时期中共党旗虽然在政治敏感度高的延安地区淡出,但在敏感度低的地方根据地仍然被使用,且作为自身政权独立性的象征尤注重在“七一”节庆活动中使用。这表明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意愿下,中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象征,此时的党旗也多使用在中共组织内部,尚未作为革命政权的象征深入到社会领域。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摆脱了统一战线政治框架的束缚,开始在各种节庆活动中使用党旗,使得中共党旗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呈现扩大态势,渐从“七一”纪念日扩散开来,元旦、“二七”和“七七”等节庆活动中都被加以使用,同时使用主体不再限于中共组织,社会群体也开始使用党旗,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化倾向。1946年“七一”纪念日,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各机关、学校和商户组织纪念大会,会场上悬挂两面党旗^[6];内蒙古各界组织召开纪念大会,会场悬挂党旗,民生电业公司也举行纪念会,会场悬挂党旗^[7]。1947年“七一”纪念日,太行区的城市中,家家悬挂党旗^[8]。1948年元旦,太岳区各界举行庆祝活动,其中阳城东关竹货铺悬挂着党旗^[9]。整体来说,1946年后中共解放区各机关、学校、商户节庆活动中皆悬挂党旗,各界群众集会会场开始悬挂党旗,到1948年底,有些地区群众集会时甚至将举党旗、抬党旗作为进入会场的必要程序,此时的党旗作为中共独立的政权象征逐渐向社会层面深入。

得益于战场上有利局面,解放区持续扩大,党旗作为中共政权独立的象征,开始取代中华民国国旗,由党政军系统向社会层面渗透。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下发旗帜悬挂的通知,指示各地在节日集会中不必悬挂国旗,倘若党政军机关确实需要挂旗时,必须悬挂党旗。该通知被中共各级党政军系统逐级传达,直到基层单位。比如晋绥行署下发通知:“规定一般的集会、节日不提倡挂旗,我部队及党政机关遇必需时可挂党旗,旧国旗一律停止悬挂,城市居民或私人商店若照例自行挂旧国旗时,暂可不禁止,但不命令其悬挂。”^[10]沙河县委宣传部布置1949年春节工作,专门提出年关挂旗问题,指示:“今年挂旗可以挂党旗,青天白日的旧国旗咱们不提倡挂,如果老百姓挂咱们不干涉。”^[11]在此精神指引下,中共党旗成为公开而合法的权力象征在解放区传播开来,而中华民国国旗被排除出中共党政军系统,中共的独立性得以彰显。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成为中共政权独立象征的党旗公开地出现在各种节庆活动中,但此时的中共并未拟制出正式、统一、严格的党旗规格,在党旗使用规定方面也缺乏清晰的标准,这致使某些地区随意乃至错误地使用中共党旗。比如有的地区随便裁制党旗,有的地区无法辨识中共党旗,悬挂出苏联国旗。针对此种情形,太行区党委专门给华北局宣传部发去信函,提议统一规定党旗的样式和尺码问

[1]《1940年的“七一”在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1940年7月7日。

[2]《社论》,《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7月1日。

[3]《儿童们在自己的节日里》,《晋察冀日报》1942年4月15日。

[4]《分局“七一”干部晚会上》,《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9日。

[5]《军区举行隆重纪念大会》,《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4日。

[6]《张家口欢庆“七一”》,《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日。

[7]《内蒙各界召开大会》,《紧张活跃大会》,《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3日。

[8]《全区党向人民公开了》,《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19日。

[9]《本区各界元旦祝捷》,《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年1月5日。

[10]《通知:停止悬挂旧国旗由》(1948年),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A90-01-21-05。

[11]《有关过春节注意几件事的通知》(1949年),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520-1-131-6。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题^[1]。得到回复后，太行区党委下发文件，指示各地：“中共党旗过去无正式规定，现正在拟制中。在党旗未正式颁布前，各地不要自行公布党旗格式尺寸及解释。群众自行悬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或锤镰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者均听之，但误挂苏联国旗者应善言劝止，免滋误会与造谣。”^[2]而有的地区将中共军队所用党旗样式作为统一标准，如晋察冀八地委发出关于挂旗的通知，指示：“党旗样式华北局尚未正式通知，兹将军委政治部通知部队所用党旗暂定尺寸，样式发下作参考。”^[3]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措施缓解了因缺乏统一党旗格式带来的尴尬，也推动了中共党旗标准化、规范化的进程。

上述可见，为显示自身政权的独立性，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能建立时，中共便将党旗作为自身形象和政权的象征使用于各种政治场合。当国共关系理顺，统一战线形成后，虽然中华民国国旗在节庆活动中使用频繁，而中共党旗使用范围缩小，呈现暂时弱化、隐退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中共放弃了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待战争局势日益明朗时，中共逐渐摆脱中华民国框架内的诸多束缚，极力突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独立性，而最终将党旗取代国旗的政治行为，则是中共寻求政权独立性的有力表征。

三、双重思虑：“统一”与“独立”

“统一”与“独立”，是中华民族抗战时期中共面临的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如何在统一的局面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使自身的独立不至于影响民族国家的统一局面？二者之间的“度”是中共需要谨慎拿捏之处。中共关于“统一”与“独立”的推敲拿捏体现在各种政治场合，包括对政治符号的选择性使用。当然，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中，随着中共实力的增强以及战争优势局面的到来，对于中共来说，“统一”与“独立”的关系已从博弈趋向于重合，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不再是困扰中共的政治难题，中共彰显自身独立的过程恰好是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过程。“统一”与“独立”的较量，也使中共根据地节庆中国旗和党旗使用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依据政治局势，中共适时地调整国旗和党旗使用的策略，分别在不同阶段和场合引入、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共党旗。这种变化固然是中国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的表征，更是中共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具备超高政治智慧的展现。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统一大局，为显示维护统一的决心，把代表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中华民国国旗引入根据地，在节庆活动中加以使用。通过翻阅根据地机关报可以发现，国旗的使用范围可谓宽泛，所涉纪念日较多，主要有“七七”、双十节和十月革命三个纪念日。“七七”为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纪念日”，带有中华民族团结象征意涵的国旗受到中共重视，成为动员、激励社会民众民族情感的符号；双十节为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边区政府庆祝“双十节”本身便是对中华民国的一种政治认同，服膺国家统一的一种表现；十月革命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是与中共意识形态关联密切的纪念日，边区政府节庆活动中使用国旗，少的是民族主义的宣扬，多的是中苏两国关系的宣示。由此可见，在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中，边区政府特别注重在具有“民族主义”、“统一战线”和“国家形象”内涵的纪念日使用国旗。显然，中共使用国旗并非随意的，或者说并非毫无目的，相反，在那些带有民族主义情感、统一战线色彩和国家象征的节庆活动中，国旗总是被加以强调、使用。

为进一步强化“统一”，相关法令的颁布无不从法制化的使用规则向世人昭示中共对于维护统一的思虑，以及赋予国旗使用这个举动的深刻政治内涵。此种政治局势下，中共对于“独立”的追求处于隐性阶段，“统一”重于“独立”的局面也给中共党旗使用造成影响。当国旗在根据地遍地开花之时，中共党旗却悄然淡出政治舞台，此现象在延安表现最为明显。据相关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几乎没有关于延安使用中共党旗的报道，甚至连“七一”节也淡出新闻报道的视野。尽管中共党旗在那些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地方根据地仍被使用，但多限于“七一”党的诞辰日。此种现象虽不等于中共放弃了自身独立的

[1]《关于悬挂党旗问题的通知》(1949年)，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A01-05-24-5。

[2]《通知：宣字第十三号》(1949年)，安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010-01-09-10。

[3]《通知：挂旗》(1949年)，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G7-11-1202-14。

旗帜符号,但足以说明其在复杂局势面前的政治取舍。

在强化“统一”的基础上,中共也在思虑如何突出自身的“独立”。从国旗使用范围来看,虽然国旗自 1938 年被引入至 1949 年初经常被使用于中共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中,但是对于中共自身的建党纪念日“七一”来说,围绕着它的任何活动都没有出现过国旗的身影,这意味着国旗在中共根据地的使用从开始便受到了限制,表明中共在国旗使用问题上有着严格的政治界限,保持、强调自身组织的独立性意图较为明显。此种认识在相关资料中得到了印证,据有关延安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国旗没有在“七一”节庆活动中被使用的情形;另据一份关于悬挂国旗注意事项的资料显示,“七一”纪念日并未包括在内^[1]。可见,中共革命政权与国民党当政的中华民国之间仍存在着微妙的政治关系,也可以说中共并未将国旗视为最高权力象征引入组织内部。

中共强调自身独立的思虑还表现国旗退出根据地节庆活动上。1946 年夏,国共关系决裂,内战再次爆发,这个突变的政治形势影响到了国旗在根据地的政治地位。象征中华民国权力的国旗在解放区开始受到冷落,从翻阅到的根据地机关报来看,1947 年后节庆中国旗使用的新闻报道寥寥无几。1948 年 12 月,晋中区党委向各地委下发文件,指示:“中央 12 月 21 日指示谓:在我们的新国旗尚未制定以前,目前各地集会庆祝,不必提倡挂国旗。我部队、党的机关必须时,除悬挂党旗外,不应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旧国旗。至于在城市中的私人、商民或居民当其在纪念日照例悬挂旧国旗时,可任其悬挂,不必禁止,但不要命令其悬挂。”^[2]这无疑为国旗退出中共根据地的判决,是中共彰显自身独立的宣言。此后,中共解放区节庆活动中国旗明显受到限制,呈逐渐消退趋势,不论是中共政权和群众组织,还是学校团体和军事系统节庆活动中都停止悬挂国旗。至于解放区社会层面仍存在使用国旗的现象,笔者以为除电文中所述:“新国旗尚未制定”的原因外,还应该为城市商民逢年过节悬挂国旗已形成惯习的因素,倘中共采取明令禁止一刀切的做法,难免徒增开展城市工作的阻力。

保持“独立”的政治意图也体现在中共党旗使用上。在中共处于劣势的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对自身独立的强调还处于隐性地位,因而国旗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合法象征而被广泛使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成为战争对手,作为国民党建国象征的国旗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使用受到影响。到了战争后期,当中共的政治、军事优势足以集“统一”与“独立”重任于一身时,中共不用为隐藏自身的“独立”,而借用其它任何政治集团的政治符号来昭示自己对“统一”维护,因为“统一”变成了他自己的事业和目标,“独立”与“统一”趋于重合,此时他们便决然地摒弃了国旗,用完全显示自身政治形象的旗帜符号来代替。最终,中共党旗成为唯一合法的政治权力符号飘扬在根据地解放区上空,且逐渐深入到社会各层面。

综上所述,从 1937 年到 1949 年,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共党旗在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政治命运,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是这些起伏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因为它们背后是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是中共不断变化的政治处境和军事实力,是中共对于“统一”和“独立”的政治思虑和取舍。诚然,国旗和党旗在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中的变化,不仅展现了政治符号自身的演化规律,也能够折射中国政局的变化莫测,更能反映出中共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

[责任编辑:肖波]

[1]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明确规定了可以悬挂国旗的七个纪念日: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七月七日,抗战建国纪念日;八月一日,八路军诞生纪念日;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纪念日;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关于悬挂国旗应注意事项》,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1-182 页。)

[2]《关于悬挂党旗问题给各地委的信》(1948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A47-01-10-04。